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媒介话语言说及其接合

——以十九大的“党代表通道”为例

岳 璐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媒介话语有助于维系和再生产政党认同、社会秩序与社会信任。十九大首次开设“党代表通道”，60位党员代表在视频直播中用个性话语表达政党理念，将个人感受升格为集体情感，在回应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时传递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与力量。同时，党员们不同的话语通过“中国梦”的环扣连接为“同一体”，并在与具体的新闻话语、多元的民间话语的互动中，经历了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动态过程。接合理论所称的“差异中的同一”的形成，代表了党员话语与社会个体实现连接的可能，更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党理念所具备的强大认同功能。

关键词:党员话语；接合理论；“党代表通道”；十九大

作者简介:岳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话语(discourse)构成社会,也被社会所形塑”。上个世纪60年以来,话语的学术解释从语言学所定义的“语言中大于句子的单位”^[1]拓展为“参与者间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2],“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实践”^[3],等等。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研究中,各种社会话语,尤其是媒介话语不仅与语法、语义、修辞有关,也与社会秩序、社会认知、权利宰制密切相连。一般来说,针对一类人群的媒介话语研究往往以弱势群体为对象,如研究女性、青少年、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权利与表达内容颇能凸显传播公平等问题。而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强势群体在各种新旧媒介上精心组织的话语言说与互动亦具有深刻的意义,更能凸显该类言说者再现的社会现实以及隐藏于再现之下的意识形态功能。

身为执政党的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4],他们是决定中国社会运行方向的重要力量,也是传统媒体关注的重点与社会化媒体上的重要言说者。由此,其媒介话语的表达颇具典型性。2017年10月18日—10月24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九大)在北京顺利召开。十九大在新闻舆论工作上推出了不少新举措,其中首次设立的“党代表通道”格外引人注目。“党代表通道”不但让媒介记者近距离接触参会党员,直接与党代表展开对话与交流,而且全程进行电视及各网络平台的现场直播,从而为考察共产党员的媒介话语提供了绝佳的对象。基于话语研究的理论视域与研究方法,本文将对“党代表通道”的相关内容进行话语分析,揭示党员的媒介话语的表达策略与言说重心,在多元又接合的话语实践中一窥中国式的政治话语建构。

一、一线与精英：“党代表通道”上的话语言说者

话语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认为话语分析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路,其一是从文本的角度对各个层次的话语结构进行描绘,其二是从语境的视角,将话语结构与语境特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要知道“意义永远生成于情境之中,而绝非仅仅基于语言结构。言说者身份和关系、环境、目的等定义了语境,并促使语言使用者在当前传播情境中选择合适的文本”^[5]。就“党代表通道”所呈现的党员媒介话语而言,“党代表通道”的特殊设计以及言说者的身份与关系是理解其话语意义的语境特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博弈研究”(17CXW038)

一方面,作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十九大成为全球热议、举国关注的焦点。大会新闻中心创造性地设立了“党代表通道”,百余名来自全球的媒体记者得以近距离地集中采访60位党代表,这是党代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而“党代表通道”的时空安排、集体采访的形式、现场直播的设计也奠定了党代表们言说的独特语境。首先,时空安排方面,“党代表通道”与2017年两会期间设立的“部长通道”非常类似,它之所以被称为“通道”,是因为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位于人民大会堂一楼大厅的东侧,即参与大会的代表们进入会场、离开会场的通道上,更因为“通道”象征着开放、透明与包容,传递的是与民相通的诚意与决心;三场见面会的时间点也颇具深意,第一场见面会设于10月18日代表们参加十九大开幕会的早上,主要谈的是过去五年的收获,第二场见面会是代表们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后的第二天——10月19日早上,主要谈的是对十九大报告的体会,第三场见面会是在10月24日大会完成了众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议程、顺利闭幕之后,大家更多聚焦在以后怎么做的话题上。如此独特的时空环境让代表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展示自己的使命与感受,回答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就大会的最新进展提供一手资讯。其次,“党代表通道”采用的是多家媒体集体采访多名党代表的形式,每场见面会都有6组党代表与媒体见面,每组2-4人不等,3场见面会分别有19、20、21位党代表与记者“零距离”接触,每位代表的发言与回答问题的时间短的一两分钟,长的也不到十分钟。相对集中、速度较快的采访方式有利于更多的党代表走上前台,传递自己的声音。最后,3场“党代表通道”全部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呈现,不仅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程直播,而且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网站,拥有数千万粉丝的@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网等中央媒体微博帐号以及地方媒体微博帐号都同步进行了视频直播,这就意味着透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组成的融媒体矩阵,党代表们的话语言说第一时间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呈现了更为生动和开放的十九大。

另一方面,“党代表通道”上的话语言说者中,“一线”和“精英”成为突出的身份特征,这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大国执政党在党员形象塑造上的新特点与新气象。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为8944.7万名^①,参加十九大的2280名党代表是从这八千多万的党员中选举出来的优秀分子^②,而出现在“党代表通道”上的60位党员又是从两千多位党代表中被精心挑选出来面对全球媒体以及广大观众的。从表1的数据统计来看,“党代表通道”上亮相的党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与女性的占比远远高于全国党员以及十九大党代表中该类党员的占比,少数民族与工人的占比则基本持平,而且25名女性党员中16人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与31名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一样,5名工人代表与2名农民代表同样奉献在一线,同时大部分公务员身份的党代表也属于基层工作人员,可以说“一线”成为“党代表通道”上最为耀眼的身份标签。不管是技术创新书写强国蓝图的科研工作者,还是工作在基层的教师、医生、护士,不管是上天入海、不顾危险的宇航员、飞行员、潜艇员,还是构筑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戏曲演员、出版工作者以及代表体育强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们,不管是潜心钻研、全心付出的大国工匠,还是默默耕耘、不知疲惫的基层警察与法官,都是奉献在一线的、坚守在一线的优秀党员,他们来自科技、国防、教育、宣传、政法、文化、卫生等各行各业的基层,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自“一线”的党员成为“党代表通道”最重要的构成,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八千万党员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大部分党员作为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奋战在各个领域的最前线,“党代表通道”强化“一线”的特征,这一人员选择的标准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表明党中央对基层党员、一线工作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参与“党代表通道”的60名党员,除了具有“一线”这一突出特点外,还有一个明显但并不被强调的特征——“精英”。当下,精英群体主要包括党政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文体精英等具体类别^[6],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党政精英大都具有党员的身份,但其他类别的精英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往往不为人所知。实际上,世情、国情和党情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执政党以工农兵、体制内人员为主的成员结构也随之改变,大批精英人士加入党员行列,党员群体与精英群体高度重合,最新的统计数据就是明证。比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干部的党员总数达3011.3万人,占党员总数的33.7%,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103.1万名,占45.9%。然而,既有研究表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官方媒体往往避免将党员描绘为精英,精英的媒介形象通常也被回避贴上党员的标签^[7]。在十九大的“党代表通道”上,这一

研究结论被打破了,党员的“精英”色彩在此表现得极为突出,浙江省纪委副书记、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等数位政府官员是显而易见的党政精英,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海尔集团的董事长张瑞敏、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合伙人杨洁是经济精英的典型,而来自不同领域的数十位一线专业技术人员也都是知识精英、文体精英的代表。

表1 性别、民族以及部分职业分别在全国党员、十九大代表与“党代表通道”中的分布^③

	女性	少数民族	工人	农牧渔民	专业技术人员
全国党员的构成	2 298.2 万	630.0 万	709.2 万	2 596 万	1 324.1 万
n=8 944.7 万	25.7%	7.0%	7.9%	29.0%	14.8%
十九大代表的构成	551	264	198	86	283
n=2280	24.2%	11.6%	8.7%	3.8%	12.4%
“党代表通道”上的党员构成	25	4	5	2	31
n=60	41.7%	6.7%	8.3%	3.3%	51.7%

“身份是在个体在共同体的互动中相互展示、协商认同的社会过程”^[8]。在“党代表通道”的全程直播中,面对镁光灯侃侃而谈的党员们,大都具有传统意义上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踏实肯干的一线工作者身份,同时大部分人还兼具着社会精英的身份特征。在此,党员的身份标签打破了相对固化的刻板印象,具有了时代赋予的新内涵,在展现大国执政党开放与接地气的精神气质的同时,也为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党代表们畅所欲言、有问有答的话语语言说定义了独特的语境。

二、个性与情感:党员的媒介话语策略

三场“党代表通道”的直播,前两场见面会每场约两个小时,第三场见面会约三个小时,共七个小时的影像,形成了近五万字的文字实录,这是60位党员代表与全球媒体记者见面时的话语表达,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下的具体言说。对这一影像文本中的符号、词汇、语义、互动等话语特征的分析^[9],呈现了党员代表们运用被认可的语言资源及言说策略表达自我、分享意义、建构价值的过程。

1. 个性话语直面“全球关切”

驻足“党代表通道”接受采访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党员代表。直播镜头前,航天英雄、科技人员、企业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不经剪辑、未加解说、原汁原味、极富个性的话语,一改过往政党语言的相对单一,更为立体地塑造了执政党及其成员的先进形象,在展示自我的同时协商着他人对政党及党员的认同。

所谓个性话语,是指充分体现言说者性格特征与语言风格的话语方式。虽然每个独立的个体理论上都拥有独具特色的个体话语,但这种个体话语经由大众媒介的“把关”之后,话语主体的个性往往有所减退,甚至消失殆尽,尤其是在传统的党员报道中更是如此。频频出现在媒体上的党员话语集中表现为高大上的口号式宣讲或是勤奋踏实、全无个性的言语转述,其结果是长期以来党员的媒介话语成为政党文件或精神的复读机,“党员”成了一个没有个性化脸谱的群像,难以赢得广大群众的认同。十九大的“党代表通道”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效创新,党员们磊落大方、有血有肉的语言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党代表们的自我介绍各有特点。研究传统文化的蒙曼教授用一句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对大会的祝愿:“万紫千红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巧妙展示了自身的专业优势;一线清淘工人苟笑红介绍自己的工作“俗称叫掏马葫芦的”,质朴的语言配合她爽朗的笑容让人印象深刻;基层法官黄志丽说自己“少女时代有个侠女梦,一心想匡扶正义、扶弱济贫,……我的侠女梦在法官生涯里得到了实现”,上海大学的金东寒代表称他的官方职务是校长、书记,但实际做的工作是上海大学的CEO,“因为我既不讲课,也不带学生,更不搞科研”,妙趣横生的介绍瞬间拉近了观众与代表们的距离。

每组代表自我介绍之后是媒介提问环节,针对代表们各自领域或特点的具体问题不断被抛出来,如医患关系、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一带一路”、新生代党员思想、中国制造的质量等话题,其中不乏敏感话题或全

球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代表们均坦率回复,声声入耳,传递着党的执政理念,体现出党员的优秀品质。三次执行航天任务的景海鹏是第一位回答问题者,面对是否再上太空的问题,他说:“再过几天就是我51岁的生日,虽然快51了,但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理,各方面状态都非常好……我真的十分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次胜仗”,真诚又满怀激情的语言感染了所有人;中央党校的教授谢春涛被问到领导班子交接的问题,他说:“我相信这次党代会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老的领导退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同志进来。我想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言语间表露出自信、开放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党员的个性话语与官方的政党话语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鲜明的个性话语间嵌入了大量的政党话语,“接地气”又“有底气”地成为连接党与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

2.情感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情感是近年来政治传播与网络话语研究的重要话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历史上,联系群众进行动员的情感话语策略从革命历史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调动民众的情绪和感受、产生移情与共情的效果一直是主流媒体报道的重要手段^[10]。在党员的媒介话语策略中,情感因素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载人潜水的世界纪录、服务器产品进入全球第一阵营、超级计算机速度保持世界第一、精益求精擦亮高铁名片、工匠精神打造中国大飞机、舰船科技成就斐然、龙芯研制与产业化、500米口径的中国天眼望远镜、传感与测试的尖端技术……来自生产与科研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与大国工匠们满怀自豪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中国纪录。大会新闻中心在安排每组出场的党代表时进行了细心的搭配,尽可能让相同或相近领域的党代表搭档。当为了挽救战机,身负重伤,胸椎、腰椎多处骨折,目前已经康复回到工作岗位的飞行员曹先剑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后,随后发言的党代表李媛所在团队从事的正是舰载机在航母安全降落的技术攻关,她告诉大家在被称为“阿拉神灯”技术的参与下首次舰载机成功降落航母已经实现。跌倒又重新振作的英雄飞行员有了高科技的保护神,两位党代表的接力讲述让人们感受到了汹涌澎湃的中国力量。

更多富有细节与温情的故事展现着共产党员的爱国情怀与强烈的使命感。舞蹈老师杨小玲告诉观众,她的学生听不见声音也不会说话,27年来她一直陪伴着他们,孩子们叫她“杨妈妈”;陶瓷贴花工人邱赛珍说:“贴花就是给胚胎瓷穿上漂亮的衣服,这个活是个精细活,是很磨人、很枯燥的,我一干就是30年,因为我喜欢贴花,我把贴花看作自己的孩子”;大庆油田铁人钻井队队长李新民说起在伊拉克打井的经历,“最高气温是零上55度,让我们这些东北汉子几乎受不了。我回来的前几天,当地部落发生冲突,在我们住的营房里发现了17颗弹头”;农民代表、河南省裴寨村的支部书记裴春亮回忆起脱贫前的生活,“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十年九旱,大年三十才能洗洗脚,家里面一盆水,先让家里面的女孩洗,家里面最长的长辈舍不得倒,还要用这个盆洗”,个人致富后他回馈乡邻,用实际行动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建设新农村。这些或抒情或深情或动情的言语表达,配合每位党代表各具特色的服装、表情以及神态,有效激发和调动了广大观众的感动、震撼、兴奋、激动等情绪,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效应,中国的自强形象、开放形象、创新形象在这情感共鸣中充分流动。

三、差异中的同一:党员的媒介话语接合与再接合

不管是偏向个性的话语策略,还是直指情感的话语策略,都代表着党员们个体话语的言说与表达。“党代表通道”将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话语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接合”(articulation)效果。联系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网友的众多评论,不难发现,这种“接合”经历了接合——解结合——再接合的动态过程,而多元差异话语的动态接合逐渐形成、强化并传递了作为同一体(unity)的政党理念与精神,这正是传播学者霍尔的接合理论所说的“差异中的同一”^[11]。

其一,通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环扣,不同党员的媒介话语彼此连接。在霍尔看来,接合就是指不同的要素通过特定的环扣(linkage)连接成一个同一体。“党代表通道”上亮相的60位党代表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说着或标准或乡音依旧的普通话,身着民族服饰或职业服饰或自行准备的盛装,发言时或紧张或神态自若,他们联系自身实际情况的话语讲述彼此间并无太大关联,但大量的高频词表明不同的话语间隐含着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环扣。词频分析对60位党

员的自我介绍与回答问题中不同词汇的使用和出现频率进行了数量规律的统计,表 2 列出了频次出现 15 次及以上的高频词 40 个。

表 2 “党代表通道”中党员话语的高频词(频度≥15)^④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中国	161	国际	38	主席	26	传统	21	祖国	17
国家	80	技术	37	产业	24	老百姓	19	农民	17
人民	56	报告	35	制度	24	团队	19	市场	17
总书记	56	精神	35	中央	24	反腐	19	国外	16
文化	51	建设	33	历史	24	党员	19	共产党	15
世界	47	创新	32	领域	22	政策	18	模式	15
十九大	46	教育	29	基层	21	体育	18	改革	15
服务	40	北京	26	科技	21	中华	18	梦想	15

60 位党员的媒介话语中,频次出现最多的前三甲是“中国”“国家”“人民”。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在党员们表达不同内容时都会提及,江苏省纪委副书记王立平说:“我是学化学的,昨天有人问我学化学的干纪检是不是反差太大了?我说没有。化学要保持自己的性质一定要去除杂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一定要清除腐败分子,道理是一样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卢丽安面对镜头深情地说:“我生长在宝岛台湾,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骄傲。”京剧演员孟广禄回答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时如此表述:“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文化的‘一带一路’我想是促进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他们对我们中国的文化非常欣赏,因为文化没有国界。”三位党员,所谈内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责任担当、国族情怀、自信飞扬无不彰显着共产党员对祖国、对人民的初心与决心。除此之外,一些高度相似或关联较大的词汇也齐齐上榜,比如“十九大”与“报告”,“共产党”“组织”与“中央”,“改革”“创新”与“制度”,“国际”“国外”与“世界”,等等。将这些高度简化的高频词列表置入具体的话语中,不难发现不同话语间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意义建构。换言之,党员们用各自的语言共同绘制了一幅反映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伟大成就与发展方向,凸显十九大报告的重要意义以及党员对党和国家与人民绝对忠诚、砥砺前行的美好画卷。

其二,在媒体的进一步报道、网友进行大量转发评论后,本已接合的党员话语经了解接合继而又再接合的过程。接合理论认为,任何促成接合的环扣并非都是必然的、绝对的以及本质的,接合也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处于一种非持久和非静态的状态。因此就不难理解党员的媒介话语在一定语境下可能形成接合,在另一语境下又可能解接合或者在解接合之后再接合。

解接合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直播中作为整体呈现的党员媒介话语与媒体对其报道的新闻话语,在微观与具体层面有一定差别,相异的要素在新闻报道中格外凸显,从而解开了原本接合的态势。比如对第一场“党代表通道”的报道中,不同媒体出于各种考量从不同的角度对党员的言说进行了分解式的呈现,《人民日报》的标题为《我们为伟大的时代而自豪》,更多强调党员话语的内在涵义,《光明日报》的标题为《党代表通道,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窗口》,更多侧重党员言说的形式意义,《解放军报》单独报道解放军身份的党员,《南方日报》专门报道来自广东的党员言论,新媒体平台比如新浪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等则对本身就是名人的党员特别关注,这样本身形成接合状态的党员话语在媒介的具体报道中解开了连接。

更为典型的解接合发生在民间话语与党员话语之间。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填满六亿多网络用户碎片时间的同时,亦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平台^[12],来自民间的各种话语的自由言说与表达已成常态,多元话语并存乃至冲突的背后是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导致的多元族群分化。微博、新闻类 APP 以及网页上众多“党代表通道”的直播频道或相关视频自然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围观与评论,其间不乏意见相左或者立场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著名作家二月河回答了有关反腐的提问,@央视网发表微博:“#全景十九大#【作家二月河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10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第二场采访上,十九大代表、作家二月河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史上罕见”,并附上了二月河发

言的视频,这一微博被转发近3 000次,评论近2 000次。其中既有高度认同其观点的网友,如“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中国加油”,也有冷嘲热讽的言论,如“这也拿出来”“现如今中国反腐力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没到前不见古人的地步……通读二十四史的作家,会不知道这些事么”,还有另辟蹊径、关注其他因素的网友,如“三分钟学会南阳话”“原来二月河长这样啊”。可以看到,反讽的批评话语、戏谑的娱乐话语一定程度拆开了“中国梦”环扣所连接的“同一体。”

尽管党员话语与新闻话语、普通网民话语之间呈现出了解接合的趋势,但是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多元话语在解接合之后,还是有可能在达成共识或确定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再次接合,即“在差异性中产生同一性,在碎片中产生统一,在实践中产生结构”^[13]。整体来看,“党代表通道”是通过各大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的直播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新闻话语的表现,作为整体呈现的党员媒介话语与媒体对其报道的新闻话语,虽有角度和对象的细微差异,人称也从第一人称全部转换为了第三人称,但它们的意义指向基本一致。在它们的话语表达中,开放透明的党代会、自强创新发展的中国、充满朝气具有担当的党员代表,共同构成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大国执政党形象,这就是一种再接合的表现。同时,虽然部分网友表达了异议,但80%以上的网友评论与转发都指向正面肯定的态度,这种肯定既有对政党的赞许,如“繁花似锦,为我的祖国疯狂打call”“愿祖国越来越美好”“厉害了我的国”等评论频频出现,还有大量为先进党员的点赞,“要技术有技术要颜值有颜值要口才有口才要思想有思想”“这是最可爱的人”“流血流汗,善始善终,方能担当重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使命在肩责无旁贷”,等等。可以说,网友评论中不同角度的观点最终汇成了对国家发展、民族希望、党员力量的正面舆论。这种再接合,主要源于党员与网民在根本利益上并无对立,同时也有赖于“党代表通道”对话语的技术性介入与使用。

就党员话语的意义产制来看,可以说,一切都在运动中,在特定条件下接合,又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变异。在党员媒介话语与主流媒体的新闻话语、普通网友的话语的积极互动中,充分的社会信任得以达成,有关党的十九大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从而实现了党员话语的意义传递。

四、结语

话语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认为,通过描述、概念化事物,话语的建构功能有助于维系和再生产社会现状,亦有可能改变社会现状^[14]。十九大的“党代表通道”上,60位不同领域、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党员用个性话语表达政党理念,将个人感受升格为集体情感,在回应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时传递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与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党员们各具特性、充满情感的不同话语通过“中国梦”环扣,连接为“同一体”,进而在与具体新闻话语、多元民间话语的互动中,经历了解接合——再接合的运动过程,从而证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党理念所具备的强大认同功能。

这种“差异中的同一”的话语互动过程具有预设的立场和群体的划分作用,受到这些话语召唤的个体进入了代表大多数的“我们”阵营,在与一切困难险阻以及他者的对立中,“我们”代表着正义和正确,并最终战胜他者,个体由此获得了归属感与安全感。它是理解被接合的话语和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是政治认同的实践过程。换言之,党员话语与个体话语的动态接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已经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在建设更好的社会和生活的愿景下,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与使命深深扎根于党员话语,从而将个体意义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将个体表述与政党理念联系起来,将个体经验与政党认同联系起来,使党员话语与社会个体形成了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统一战线。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组织部,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30/c_1121242478.htm,2017-12-1。
- ② 数据来源:中组部负责人就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答新华社记者问,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9/30/c_1121752629.htm,2017-12-1。
- ③ 数据来源:全国党员的构成分布数据见注释①,十九大代表的构成分布数据见注释②,“党代表通道”的党员构成分布由

笔者统计。

- ④ 由于高频词分析主要是为了呈现党员话语的焦点,因此该表中去掉了称呼、修辞用语、礼貌用语等,包括大家、谢谢、觉得、问题、记者、我们、我的,等等。

参考文献:

- [1] 鲍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0.
- [2] 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3.
- [3] 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84.
- [4] 习近平主持会议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管理工作[EB/OL].[2017-12-1].http://www.gov.cn/ldhd/2013-01/28/content_2321165.htm.
-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91.
- [6] 魏淑艳.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J].公共管理学报,2006(3):28-33.
- [7] 夏倩芳,张明新.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1979—2005年中国大陆主流报纸新闻中的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29-41.
- [8] Benwell B, Stokoe E. Discourse and identity[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147.
- [9] 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37-42.
- [10] 乔同舟.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J].理论与现代化,2016(6):84-89.
- [11] Procter J. Stuart hall[M]. London:Routledge,2004:72.
- [12] 岳璐.基于网民应对的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148-155.
- [13] 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12(1):42-49.
- [14]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Routledge, 2013:69.

The Expression and Articulation of Media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delegates’ passage”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UE Lu

Abstract: The media discourse of Party members contributes to maintaining and reproducing the party identity, 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social trust. “Delegates’ passage” was set up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Sixty Party delegates expressed their political ideas in their own words on live broadcast, which elevated the personal feelings into collective emotion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spond to national issues and tell China’s stories, in the meantime, it delivers the confidence i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Moreover, the different discourses of the Party members were linked to an unity through ‘China dream’.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pecific media discourse and various folk discourse, they experience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y amo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 represented the possibility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y discourse and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individuals. Furthermore, and it validated the powerful identific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Party member discourse; Theory of articulation; “delegates’ passag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任编辑:文晶)